

《寻路中国》 摘抄

彼得·海斯勒 著

2023 年 8 月 5 日



译文纪实

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COUNTRY DRIVING

Peter Hessler
[美] 彼得·海斯勒 著
李雪顺 译

寻路中国

“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
——柴静

上海译文出版社

书本封面

1. 当然，更不可能有中国的驾驶员开车前往中国海南中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目前，有五个国家为这块领土正争得不可开交。斯普拉特利群岛上没有百姓居住，不过，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对它拥有主权，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中国汽车地图册》因此用一页纸的篇幅，画出这个岛链。只有地图，没有道路，全书仅此一处。
2.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甚至做过这样的考虑：把长城改造成一条公路。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汽车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地理格局。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城市设计者们，支持各个城市把原来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拆掉，并把拆下来的材料用于修建适合于汽车行驶的环城公路。到 1931 年，先后有二十多个城市采用了这样的策略，其中就有南方的广州市，他们拆掉的建筑物具有八百年以上的历史。不可避免的是，现代人把注意力投向了长城。1923 年，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城筑路之废物利用”，其作者雷胜（音译）对政府刚提出的一项使类似建筑物现代会的议案表示支持。在雷胜看来，这种做法是“一次难得的良机”。他写道：“长城起自山海关，终于玉门关，蜿蜒数千里，且为直线。改造成马路后，它将连接北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各地，使经商更易……”这项议案喧闹一时——1931 年，颇具影响力的《学生杂志》都对它表示了支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有了取自长城的砖石，“所需资金甚少可以达到填补交通设施之大不足，自东向西，由沿海之内地……”
3. 在现代中国，修建道路通常是应对贫困或者金融危机的一项策略。首次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运动始于 1920 年，当时的一场旱灾在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要把粮食送到忍饥挨饿的人们手中，十分困难——因为自封建帝国开始，中国的道路交通系统都是为马拉车而设计的。美国的红十字会主持了一个项目，修建适合于大卡车和小汽车行驶的现代道路系统。到 1920 年 10 月，他们开始在山东境内修建公路。他们在当地雇佣了一些农民，其中好些人都几近挨饿的状态，因而一条条新修建的道路使得运送救济物资的大卡车可以到达需要的地方。在山东境内领导修

建工程的美国工程师奥利弗·托德估计，通过新修建的道路直接或间接地向五十多万人运送去了食物和燃料。

4.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5. 1983 年，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就对纽约做过一次这样的访问。在与纽约市长爱德·科齐以及其他政要举行的一系列会谈的往返途中，他得出了一项关于道路状况的非常重要的观测结论：曼哈顿的驾驶员在夜间是要开灯行车的。回到中国后，陈希同要求北京的汽车驾驶员也这么做。至于这位市长在遭遇美国的民主社会后作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结论，一直不甚明了（他最终因为贪腐而锒铛入狱），但他至少为道路交通安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6. 跟美国汽车公司不一样，在中国的其他外国公司从那几年艰苦的岁月熬了过来，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为止，有些公司开始赚取巨额利润了。这个产业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因此限制了互相之间的竞争，从而使价格维持在虚高的状态。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汽车消费者落后了几代人，这使得外国汽车制造商可以把海外一些已经过时淘汰的制造技术拿到中国市场来。20 世纪 90 年代，大众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维斯特莫兰有一条原本用来生产大众 FOX 车型的报废生产线。公司将其主要设备搬迁到了中国的东北，生产出的轿车叫作捷达，后来超过桑塔纳轿车，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乘用车。利润也十分惊人：在 2001 年和 2002 年，以单台轿车计算，大众和通用汽车两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获利，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别克公司每卖出一辆君威车，获得的利润是美国市场上同一车型的两倍。迈克尔·杜恩是专门研究中国汽车市场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在那一时期，他曾经就中国市场的获利问题问过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我们赚的钱，比上帝还多，”通用公司的经历这样回答。
7. 只有遇到坏事时，你才会发现车辆的好坏。

8. 当地人告诉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支援阿富汗反抗前苏联入侵，向阿富汗提供了大批山丹马。
9. 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
10. 1995 年，中国政府举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人们不想让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其他一共五千名具有政治主张的外国妇女造访首都。于是，她们被安排到了怀柔这个地方——这算得上是一种驱逐吧。
11. 江泽民时代以城市的发展而闻名，胡锦涛则对农村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
12. 在武义县，有个人就直接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扑克牌。后来我才了解到，武义年产扑克一百万副，占到了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八十公里外，义乌市生产的塑料饮管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嵛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汾水专门制作粉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作嵛州的地方。
13. 目前，由于计划经济早已不存在，中央政府往这个地方（[浙江丽水](#)）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的各大城市只能靠自己筹集所需的资金，可是法律上又不让他们像美国的城市那样发行地方债券。他们也无法征收财产税，因为土地是国有的。税收的基础十分薄弱，对于刚刚起步的工业区尤其如此：在丽水的经济开发区里，公司在开始投产后的头三年内，享受税收减免。那之后，大多数公司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收益报告上做手脚。这对于公司和官员们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们可以得到优惠待遇、收到现金和应有所有的中华香烟——可是，这座城市要靠税收维持运行却不大可能。
14. 王丽娜（音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她告诉我，沿海地区的各大城

市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房地产交易。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跟公司有很多相似性，市长则是 CEO。“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是明摆着的，”她说，“不过，他们不能只出卖房地产。投资者不是傻瓜——他们的心里十分明白，不禁要问，如果城市里面没有工业，谁还会来买房子。”

15. 换句话说，丽水市只以八千万的价格买得这片土地，经过三年时间，他们就以接近三个亿的价格抛了出去。
16.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当我听到刘宏伟如何记住那台机器的构造并仿制出来时，我想起了在 19 世纪初同样回耍这一手的弗朗西斯·凯博·罗威尔。那一时期，美国社会蒸蒸日上，而英国人把卡特莱特水力织布机的设计图纸看管得十分严实。不过，罗威尔冒名参观了曼彻斯特的作坊，回到马萨诸塞后，凭着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把那台机器组装了出来，他所在的公司由此成为了美国纺织工业的基地。
17. 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